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展望及对策

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 刘 萍

[摘要]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车轮”,只有双轮驱动才能达到现代化发展的彼岸。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市化作为一项国策,对于扩大需求、缩小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平、调整产业结构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不相协调的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复杂性。

[关键词]工业化 城市化 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要实现上述目标,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和全面小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发展的根本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协调它们两者的关系是当前我国面临解决一系列难题的明智选择,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把城市化作为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是中国走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约,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缩小贫困两极分化,并最终使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动力所在。“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说过的一句话,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1]所以研究协调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在当前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理论

(一)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中,工业化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工业化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化率提高,但实质上与城市化率上升联系密切的是农业就业向非农业就业这一就业结构的转变,正是因为就业结构的工业化和非农化直接带动了原来的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因此,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一般而言,工业化过程中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多,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就上升较快,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就较强,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正具备这一特点;如果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由于有机构成高,提供就业机会较少,由此带来的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就上升较慢,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就较弱,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属于此类。其实也不尽然,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的各个进程(轻工业、重工业及第三产业)所引起就业结构的转变对于城市化演进都具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重工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大,但由于重工业化过程中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所导致的企业对外部环境及社会服务的依赖性不断增加,第三产业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同样对就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由重工业化所引起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同样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影响就业结构,就业结构作用于城市化进程,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直接影响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的速度。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对非农化的拉动效应。

(二)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效应。当工业化和城市化经过了启动阶段以后,城市发展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就日益显示出来了,工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要求的服务系统越来越复杂,而城市将企业集中起来,可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益,企业集中在一起,可以减少相互间的交通运输费用,可以相互交流信息、互相提供服务,可以分担基础设施费用等,这就是所谓的“集聚效益”。同时,城市人口多,市场大,企业集中,靠近市场,就缩短了生产与消费的距离。在资源约束日益转向市场约束的变动经济中,接近市场有助于效益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发展。

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但两者的关联性在不同阶段变动的趋势又是不同的。当工业化水平低下时,城市化水平的发展与之紧密关联,工业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产值比重尽管不再增加甚至下降,而城市化水平却继续上升。由此可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动关系,随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区别。工业化初期,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发展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化对城市化产生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之后,是以资金、资源密集型为特征的重工业化阶段和以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高度化阶段,这时服务业比重上升对城市化进程具重大影响趋势愈加明显,工业化导致就业结构变化,从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实质就更清晰的表现出来。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对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有更强的带动效应,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比工业就业比重,产出增长更直接地作用于城市化进程。因此,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之后,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这个阶段工业比重相对或绝对减少但城市化水平仍上升。

从城市化的总体进程来看,工业化和服务化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动力系统。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的根本作用体现在:持续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直接的需求;工业化会产生对服务业的衍生需求从而增加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转移劳动力收入提高后会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更多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扩大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即便是在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很高比重的城市,也必须重视工业化的战略地位,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实施。否则失去工业化支撑的第三产业发展必然在低水平上徘徊,人均GDP的持续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将前景暗淡。

二、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总体水平与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工业产值增加值比重已多年接近或达到 GDP50%的水平,2004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 72387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43384 亿元,占 GDO 的比重分别为 53%和 31.8%。这意味着工业化水平达到了较高程度,说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一般在 30%至 70%之间处于加快上升时期。我国到 2004 年城市化水平已达到 41.8%,比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设市城市已达 661 个,建制镇 19892 个;城镇人口 54283 万。^[2]目前,中国工业产出的 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的 70%以上,国家财政税收的近 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85%,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 90%以上集中在设市城市^[3],因此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到 2020 年实现“小康社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国家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根据再“翻两番”的目标,2020 年我国人均收入应接近 4000 美元(2000 年不变价格,按美国近年 GDP 综合价格指数折算,1964 年与 2000 年人均 GDP 换算系数为 1:4)即 1000 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届时城市化率应达到 63.4%,GDP 结构中制造业比重应达 33%—34%之间,但考虑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等原因,依此做的各项估计要相应调整。因此参考以上标准,并结合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发展水平,专家估计 2001—2020 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和总体目标是:中国城市化率 2020 年总体目标将达到 55.1%;GDP 结构中非农产业比重应达 90%上下,服务业应达 55%上下;就业结构中,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应达 78%^[4]。

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进程,我们不难看出:本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的加快发展阶段,但我国的第三产业还无法承担推动城市化的主力角色,工业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核心任务,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进。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将是一个长期任务。2004 年中国城市化率为 41.8%,即便按“2020 年中国城市化率应达 55.1%”的审慎估计,现实与目标仍相差 15 个百分点,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每年城市化率要提高 1 个百分点,即每年约 1000 万至 1200 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4]。因此,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既要抓住机遇,创造条件,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健康发展,不能超越阶段,操之过急,毕其功于一役。

三、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考

要实现中国城市化的估计目标,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结合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结合发展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结合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要始终注意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

(一)调整工业化战略,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如前所述,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进程是紧密相关的,要加速城市化进程,就要加快工业发展,适当调整工业化战略。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的趋势是:(1)整个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占优势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演进;(2)从要素投入看,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逐渐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演进;(3)从生产结构看,产业结构由制造初级产品占优势逐渐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演进。要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调整我国的工业化战略。

调整城市工业化发展战略,首先,应在重工业发达的基础上走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道路。最近 20 多年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核能等随着新技术的突破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成为经济国增长的主要来源,传统的重化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特别是对新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传统的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与此同时,新兴产业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党的十六大报告给我们指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其次,我国是人口大国,在现在和未来的几十年内,就业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劳动力丰富、资金短缺和自然资源稀缺是我国的基本特点,因此要根据我国要素的特点适当地发展劳动密集、资金密集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总之,城市工业化其核心是要把握国际经济发展命脉,尽快从初级工业中退出,转而发展附加值高,以资金技术为主的新行业新部门,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加入全球产业链,实现国际标准化。所以我国工业化的根本目标应是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工业的更新换代,促进工业结构的转换升级。

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阻碍国家现代化实现的主要问题。要想让农民富起来,必须减少农民,把大部分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必须走城市化道路。由于目前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受土地资源的约束,“收益递减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农业已成为边际产出最低的行业;人均耕地越来越少,隐性失业日趋严重,不能充分就业成为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在农村工业化发展初期,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对农村工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 and 引导,导致农村工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企业分布过散、规模过小。基于以上原因,在目前还无法大规模地向异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还必须就地消化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工业。农村要根据劳动力丰富,资金和技术相对落后的特点,发展劳动密集

型产业,根据比较利益原则从事劳动力多,附加值低和产量大的轻纺、食品加工等,走发展初级工业的道路。但是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立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阶段农村工业化的道路选择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迄今为止,多数地区的农村工业化仍然是在“离土不离乡”的原则下进行的,这无疑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起了推动作用。但当资金密集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一原则就会促使生产规模过于狭小和布局过于分散,特别是对社区所有的企业模式而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布局的集聚都会受到阻碍。因此,应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逐步将分散的农村工业集中到城市和城镇的工业区内,最终把农村工业纳入到城市大工业中来。

(二)改变城市化战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制定出“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这一方针对大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过多限制,严重影响了大城市的发展以及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应该起到的作用;而在小城镇建设上,主要依靠民资民力,过分依赖农民建设小城镇,导致小城镇数量多、档次低,降低了城市功能,形成“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低水平的城市化发展格局。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经验来看,发展最快的是大、中城市,其次是小城市,最慢的是小城镇。21世纪,人口向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带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前在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城市规模过度扩张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改变城市化落后的现状,把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加快城市化,尤其是加快大城市发展的方向上来,重新认识大中小城市之间的比例关系,目前中国城镇体系不合理,主要是规模在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比例低。根据国情特色,借鉴世界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本文认为当前在我国应当要合理发展大城市,重点培育和发展中小城市,同时也要加强小城镇建设。

合理发展大城市。适当鼓励有些功能齐全的大城市优先发展,突出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其集聚辐射功能、综合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要从大城市的功能和特点出发,大力发展城市型经济,提高城市的集聚和吸纳能力。城市产业布局要优二兴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要积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服务业和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商贸旅游业和金融保险业等,以增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而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还要根据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情况,在自然条件好和经济发达地区,重点扶持大城市发展,建立一批国际化的大都市或联系紧密的城市群,以此增加城市容量并加强城市对经济的带动功能。我国大城市大多位于具有较为完整城市体系的沿海地区,它们的城市化潜力在于发挥城市集聚的优势,通过形成诸如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模式,达到“以城带乡”的农村城市化和郊区城市化进程。因此,如果能把市场化条件下工业企业选址的动机与城市周围的农村或郊区的区位优势相结合,这种新的区位观则可以通过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形成我国带有区域特色的新一轮城市化契机。

重点培育和发展中小城市。在发展大城市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中小城市建设,以适应中国人口多,大城市承载能力有限的特点。目前我国中小城市的城市化面临着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规模升级和功能定位的问题,这对于我国中小城市尤其是人口规模小于20万的小城市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小城市规模不足和城市基础设施运营成本过高制约了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从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那些以小城市为主的地区经济发展,因此,提高中小城市的聚集经济效应并进一步发挥对外辐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对中等城市要着重提高档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要培育为中等城市,充分发挥各具特色的区域中心城市作用。中小城市要集中发展突出的产业或产品,这些产业和产品的选择可以建立在加工地区优势资源的基础之上,也可以与其附近大城市相联系,为大城市生产初级加工品或配套零部件,加入大城市现代化产业的循环,成为其一部分。中小城市要注重城市内涵质量和城市开放度的提高,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强化优势产业和专业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导向作用,着力培植知名品牌和行业龙头企业,更好地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特色优势。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分层次高起点地推进城市建设。

加强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发展的重点是扩大小城镇规模,增强小城镇的聚集功能,促进地方中小企业适度集中于小城镇发展,将小城镇建设与城镇体系整体布局和农村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发展区域性的中心镇、重点镇,积极引导具备条件的小城镇向中小城市发展,努力改变目前“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低水平发展状况。建议在每个县(市)确定1—2个、人口规模在5万以上的重点镇,加以重点培育、重点建设、重点发展,充分发挥其在集聚要素、发展规模经济方面的示范作用。农村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城镇,而是通过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并以此为基础,调节农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三)发展第三产业,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影响了工业化的整体演进和城市化的进程。到了21世纪,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工业和农业的结构升级也依赖于市场中介和高层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大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到2002年,我国的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3.5%,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为21809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还不足30%,^[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据测算,即使按我国现有水平,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

增加700万个就业岗位。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现代服务业,以此带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在发展第三产业时要注意第三产业的高级化。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伴随着第三产业的过度发展,过多的小商小贩、小规模不规范的餐饮服务、简单的运输业等等,这些第三产业的经营效益差,风险防范能力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小,过分发展只会引起人口在城市的过度聚集而不可能产生聚集效应。我国在发展第三产业时,要发挥后发优势,从一开始就重视第三产业现代化,如建设现代化的商业化网络、交通运输系统、先进的邮电通讯、规范的金融和旅游餐饮服务等。

(四)调整劳动力转移政策,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行城市带动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上,要改变过去一味强调就地转移的单一政策,根据实际情况,拓宽劳动力转移的思路,在继续利用乡镇企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适当考虑向大城市内部转移剩余劳动力和拓宽农村就业渠道这两个方面,来减少剩余劳动力数量。

首先,要重视向大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我国的大城市中并不是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人满为患,我国所存在的失业问题,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结构性失业,一方面是有的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工作没人去做或没人能做。以第二产业为例,我国的第二产业受国家扶持,相对比较发达,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是16077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是21.6%^[5],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曾达到45%,说明我们的第二产业并非已发展到再没有发展余地的地步。目前我国国有工业企业设备闲置、人员下岗主要是一般加工工业能力过剩,能为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人民生活提供品种繁多的设备或设施的高级加工工业还非常欠缺。尤其是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不合理的就业结构,这些都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和速度。适当调整产业结构,可以使剩余劳动力在地区间和部门间合理流动,加强城市第三产业建设是吸收城市失业者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有效手段。近年来,农民进城务工、流动就业已成为中国农民城镇化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我们要从战略上看待农民工现象。2004年离乡进城务工农民有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4.5%^[2],农民进城务工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渠道。但农民工转成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城市居民,还有一个不断适应、不断筛选的过程。因此,国家应有相应政策,一是要注意给进城农民工留条退路,不要急于收回他们的承包地,这样农民工进退有路,既可以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又可以减少社会稳定的风险。二是对于已经长期工作和生活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要适应城市发展的趋势而有步骤地将其转变为城市人口。

其次,拓宽农业就业渠道,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越是工业化、城市化,越要打牢农业基础。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曾有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不能再走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牺牲农村保城市的老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是安天下的产业,这就要求我国要发展高效农业部门来养活自己,来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还较低,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农村中还存在吸收劳动力的较大空间。因此,只要国家能制定出合理的农业政策,农业内部吸收劳动力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要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村重新开辟就业渠道,政策鼓励是第一位的,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建设,增强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否则农民在“城市幻觉”的作用下也会盲目离开农村,无心农村工作和生活。要增强农村活力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重视农业发展;二要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三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要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要让在农村地区生活的人,可以从事与城市相似的生产活动,能获得与生活在城市和从事其它产业的人同样的收入,也能享受现代文明。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在我国人口众多、资金不足、农村发展落后的情况下,加强农村的综合发展与综合建设,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也是一种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转换空间的城市化形式,可以达到减少农村人口对城市的过分冲击,最终实现城市化的目标。

四、结论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各车轮”,只有双轮驱动才能到达现代化发展的彼岸。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相互促动的关系。协调二者的关系,最重要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大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城市带动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市化作为一项国策,对于扩大需求,缩小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平、调整产业结构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不相协调的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复杂性。近几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研究蓬勃开展,研究成果有效地推动了各都市圈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全国相继崛起了五大都市圈,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的典范,为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思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抓住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难得机遇,加快城市化的发展步伐,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这将为我国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闯出一条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转第13页)

性极为巨大,是水电企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

不过,当前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坝安全,而对其他由技术因素和管理因素引发的安全隐患关注不够。这就要求将安全问题提升至战略的高度加以管理,通过安全战略分析剖析水电企业安全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辨识哪些是由于管理方面的失误而引发的安全隐患进而实行有针对性的管理;通过安全战略制定确保对水电项目实施从设计、施工到生产运营的全过程的安全管理;通过健全评估水电安全生产的指标体系,通过安全责任的层层分解,通过完善安全监控机制并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安全战略的顺利实施。

(2) 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水电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水电企业对于水电项目的不当开发,会引发江河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产生极大的社会成本,导致外部不经济性。而且水电项目的不当开发还会对水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不良生态环境会加速电站老化和折旧,使得电站的预期寿命缩短;植被的破坏导致森林草地蓄水能力的下降,使得库区来水量下降且不稳定,造成水电机组不能正常运转;不良的生态环境还迫使水电企业花费大量经费用于打捞垃圾和工程性维修治理(夏峰等,2005);移民安置不当会引发企业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不断,都会对企业的正常生产和效益产生不良影响。

可见,水电项目的环境问题会引发水电企业的高额费用,使其低成本战略难以继续;而且会使得企业声誉受损,引发企业无形资产的贬值,进而丧失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这就要求水电企业能够坚持以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水电项目开发的根本切入点,在项目设计时进行正确测量,并在计划早期消除引发环境问题的隐患,通过实施环境战略,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企业的生产成本及其负外部性降到最低。

由于安全战略与环境战略关乎水电企业的生死存亡,决定水电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性,因而在构建职能层面战略时,必须将二者作为战略重点,但为了确保企业公司层面战略和业务层面战略目标的实现,水电企业还应辅之以战略联盟、全面质量管理战略、时基竞争战略、信息战略、创新战略等其他职能层面的战略。

三、水电企业发展战略的有效匹配

水电企业发展战略是由各层面的不同子战略构建而成,而且水电企业的环境复杂多变,只有各子战略相互融合,与动态环境的相互匹配,才能确保水电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1、水电企业各子战略之间的匹配。水电企业各层面战略之间、各层面内部战略之间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他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构建了水电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总体而言,各层面战略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在短期内,各战略目标之间或许会存在冲突。如企业过于强调安全战略、环境战略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进而使企业的低成本战略目标难以实现,同样,业绩压力如果过重,员工就会更多地关注业绩指标,而忽视安全问题。这就要求通过各层面战略间的纵向匹配,即实现公司层面战略、业务层面战略与职能层面战略的有效匹配,使得上一层面战略有效指导下一层面战略,下一层面战略又能确保上一层面目标的实现;同时通过同一层面间的横向匹配,即探求职能层面内部安全战略、环境战略之间的有效匹配,以及探求二者与其他职能层面战略之间的最佳战略结合点,实现各战略之间的有效融合。从而使水电企业发展战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使水电企业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做出平衡。

2、水电企业发展战略与环境间的动态匹配。水电企业面临的环境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中,这就要求水电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过程中考虑其动态适应性,尤其我国的水电企业正处于电力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又处于经济转型这一特殊背景下,因而水电企业面临的环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水电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心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不断发生迁移,先前成功的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可能会成为企业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而在制定水电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将环境动态变化的因素考虑在内,确保水电企业发展战略的动态适应性。这就要求水电企业更多地关注环境分析,在原有的SWOT等战略分析工具基础上,更多运用动态分析的工具,如博弈论、情景分析、仿真分析、系统动力模型等,借助这些工具,更好地把握住环境动态变化的规律,确保企业发展战略与动态环境之间的最佳匹配,进而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 [1]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2]格里·约翰逊、凯迈·斯科尔斯. 战略管理[M].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1月版.
 - [3]迈克尔·波特. 竞争论[M]. 中信出版社,2003年1月版.
 - [4]周三多,邹统钎. 战略管理思想史[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
 - [5]夏峰、洪尚群、叶文虎. 云南水电生态化的生态补偿[J]. 人民长江,2005(2):31-33.
-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影响企业知识共享与整合(KSI)的主要(典型)文化、习惯、社会因素(现象)及其管理研究”项目编号:70571070)资助。

(上接第4页)

[参考文献]

- [1]加快城市化步伐势在必行[N],人民日报,2005-03-03,第十四版.
- [2]马凯主编. 200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199
- [3]陈力勇.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J]. 改革研究,2004,4
- [4]江小娟主编. 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41-247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